

《楚辞》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周建忠

内容提要 韩国古代文人在接触中国典籍、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屈原和楚辞。楚辞作品最早是在韩国的三国时期，依托于《史记》、《汉书》、《文选》等文献传入韩国。此后，古代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的加强、韩国古代翻刻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楚辞文学在韩国的流播。韩国文人不仅经常阅读楚辞、创作楚辞，而且系统深入地研究楚辞。他们对楚辞的学习、创作与研究，既给韩国的汉文学、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学典范，也为整个楚辞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楚辞》 韩国 传播与接受

爱国主义是国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民族力量的源泉。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爱国诗人，其爱国情怀既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典范，也是儒家文人们竞相依归的人格高地与心灵栖所。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对韩国汉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韩国古代文人较早地接触到了屈原和楚辞，学习和发展了楚辞文化，为整个汉文化圈的文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韩国汉籍中留存的关于楚辞的新材料，为用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探析楚辞对韩汉文学、传统文化的影响提供了可能，亦为楚辞文学地位与价值的重新审视提供了新思路。纵观韩国现存的两种最大的文学总集《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以及其他相关别集，我们发现研习《楚辞》的韩国文人的数量非常之多，内容涉及楚辞文化的诸多方面，如他们在作品中经常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甚至有专文论述等。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楚辞文化不惟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韩国汉文学史和韩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楚辞》传入韩国的情况

楚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较早地传入了朝鲜半岛。据现存的中韩文献可知，楚辞作品传入韩国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史记》、《汉书》、《文选》的传入时间。因《史记》、《汉书》论及屈原与屈赋，以及《文选》中收录的十三篇楚辞作品使得韩国文人早已知晓屈原与楚辞。然而，《史记》、《汉书》、《文选》何时最早传入韩国，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旧唐书·高丽传》中记载：韩国三国时期高句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中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①。此材料中提及《文选》，高丽人尤其喜爱，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3&ZD1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文献语义化研究”（10BTQ03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关于韩国楚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2JDXM020）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册，第5320页。

又提及《史记》、《汉书》，因此可以推断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及其声名正是借助于《史记》、《汉书》、《文选》等在高句丽得以传播与流行，并为当时文人所熟知。《史记》、《汉书》、《文选》又是何时传入百济和新罗？《文选》可能由萧梁直接传到百济（中大通六年或大同七年），较之高句丽稍早一些。而《文选》流传新罗的时间，稍晚于百济、高句丽^①。又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四年条“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② 基此可知，元圣王四年，新罗选拔读书人才的条件中就有以通《文选》、三史（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标准的。亦即至迟新罗元圣王四年（788），《史记》、《汉书》、《文选》等就已经传入新罗。据上文的考述，《史记》、《汉书》、《文选》等在韩国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至公元668年），已经东传槿域，流行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楚辞作家及其楚辞作品也随之为韩国历代文人所了解与熟悉。

在《楚辞》海外传播史上，《楚辞》传入韩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楚辞》版本流入韩国的情况相当复杂，而现存文献同样没有明确的记载。当下韩国各大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存有较多的古代《楚辞》版本，此外还有数量繁多的版本存在于私人藏书家手中。韩国到底有多少种古代的《楚辞》版本，至今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因此很难从现存的《楚辞》版本上推断出《楚辞》传入韩国的最早时间。以下主要通过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楚辞》版本及朝鲜王朝时期各家抄本的调查与分析，了解《楚辞》文献在韩国传播的特殊情况。现存于韩国的古代《楚辞》版本可大致分为中国刻本、日本刻本、韩国翻刻本、韩国抄录本四类。

首先，从传入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和日本的《楚辞》刻本来看，当时《楚辞》在韩国的传播非常普遍。中国刻本与日本刻本的直接传入主要是出使中国的高丽（包括朝鲜）使臣携带注本回国。他们获得这些书籍的主要途径，是中国朝廷赐给的或使臣的个人购买。《楚辞》注本传入最多的当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关于朱熹所注典籍的传入，在韩国文人撰写的《朝天录》、《燕行录》等使行日记中多有记载。

根据韩国所藏中国刻本、日本刻本，可以考释楚辞文献在韩国流传的版本信息与传播情况，这是楚辞学史、楚辞传播史上弥足珍贵而又普遍缺失的重要资料。如《楚辞补注》日本宽延二年（1749）皇都书肆柳美启等重刊汲古阁本，《天问天对解》民国六年（1917）刊《豫章丛书》本，《楚辞集注》日本庆安四年（1651）刊本、清康熙听雨斋重刊套印沈云翔辑八十四家评本、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等，不仅在中国、日本有藏本，亦早已传入韩国。另按，朝鲜王朝时期安鼎福编纂《群书并文》时，抄录卢之颐《楚辞序》与班固序、刘勰《辨骚》^③。经考，卢之颐《楚辞序》仅见于清初溪香馆《楚辞章句》十七卷刻本中。又，安氏抄录的顺序亦与此本的编次相同，仅仅省略《楚辞目录》、《楚辞疑字直音补》、司马迁《屈原传》。因此，安鼎福《群书并文》抄录的底本应是清初溪香馆《楚辞章句》本。据此证明，在安鼎福所处的朝鲜王朝后期，该刻本已传至韩国。但此刻本在现存韩国古籍书目尚未著录，其或被遗漏，抑或散佚于民间，仍有待进一步寻访。

值得一提的是，林云铭《楚辞灯》远播海外，在槿域所藏版本众多，林氏于楚辞之普及实有功焉。其康熙三十六年（1697）挹奎楼刊本藏于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日本文政七年（1824）重刊宽政十年本，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另，学界所知日本宽政十年（1798）刊大阪池内八兵卫刊本（实为日本宽政十年刊大阪池内八兵卫据清杨攀梅重订本之重刊本），亦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是书扉页

① 参见朴贞淑《〈文选〉东传时间及其途径》，《东方丛刊》2009年第2期。

② 金富轼撰、坪井九马三等校《三国史记》，吉川弘文馆1913年版，第126页。

③ 安鼎福《群书并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83—87页。

携“晋江杨羹汝重订 晋安林西仲先生楚辞灯 千百年眼 河内堂”，卷端题“楚辞灯卷一”，次行署“晋安林西仲先生论述 男林 沅芷之较正晋江杨攀梅羹汝重订”，由此推知，《楚辞灯》清杨攀梅重订本虽未被学界著录，却借日本大阪池内八兵卫据清杨攀梅重订本得以保存。此外，从以上这些传入到韩国的中国《楚辞》刊本，以及在日本刊刻又再次传入到韩国的《楚辞》刊本，亦可推知《楚辞》在东亚汉文化圈内的传播特征，朱熹《楚辞集注》、林云铭《楚辞灯》的多次刊刻，充分说明《楚辞》传入朝鲜早期的特点，往往避开《楚辞》本身文本阅读训释的困难，主要通过义理阐释、思想推演而达到初步的普及与传播之效。

其次，韩国《楚辞》翻刻本的大量出现主要在朝鲜李朝时期。在朝鲜时代，对中国历代文献的翻刻是很普遍的现象，毕竟各种文献在初次传入韩国时数量有限，而韩国文人对中国文献的阅读需求极大，阅读速度又极为迅速。为了达到读者阅读的需要，且基于朝鲜纸业与刊刻业的高度发达，“翻刻”成为朝鲜时代的一种盈利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这种翻刻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籍在朝鲜的传播。现存的大量翻刻本对于韩国楚辞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通过翻刻的时间、地点、数量等可管窥《楚辞》在韩国不同时期的传播和接受程度。

按，朝鲜王朝世宗李祹曾下诏翻刻《楚辞》，据《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年（1428）记载“庚申，御经筵。命左代言金赭曰‘《文章正宗》、《楚辞》等书，学者不可不知，其令铸字所印之。’”^①充分反映了朝鲜最高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文学精品《楚辞》的极度嗜好。鉴于李朝时期是性理学的全盛时期，南宋的性理学家朱熹《楚辞集注》在李朝的流行自当必然，故世宗朝以后《楚辞集注》的翻刻更是不计其数^②。现今，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楚辞》翻刻本的数量实多，版本各异。以韩国最为著名的两大图书馆为例：

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

（1）《楚辞》1册，木版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22.3×15cm，有界，11行21字，大黑口，上下黑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世宗年间（1418—1450）本。

（2）《楚辞集注》1册（卷4—8），训炼都监字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25×15.4cm，9行17字，注双行，上下细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光海郡年间（1608—1623）本。

（3）《楚辞后语》1册（零本），戊申字，四周双边，半叶匡郭：24.8×16.8cm，10行18字，注双行，上下细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肃宗年间（1674—1720）本。

（4）《楚辞集注》8卷，《后语》6卷，《辩证》2卷，合4册，戊申字，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4.9×17cm，10行18字，注双行，上下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英祖年间（1724—1776）本。有侍讲院、春坊藏、帝室图书之章。

（5）《楚辞辩证》1册，木版本，四周双边，上下花纹鱼尾，半叶匡郭：24.2×17.6cm，有界，10行18字。刊地未详、刊者未详，朝鲜王朝中后期本。有春坊藏、正山弟子、侍讲院之章。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

（1）《楚辞后语》2册，《楚辞辩证》1册（卷上下），木板本（庚子字覆刻），四周双边，半叶匡郭：21.0×14.9cm，有界，11行21字，注双行，中黑口，内向黑鱼尾。跋：岁在癸酉，余来官于兹。其年冬，监司李相国崇之巡至此邑，谓余曰“余于是，鸠材募工，营业其事，不阅月而功讫……于是乎书，府使中训大夫兼劝农兵马团练使李皎然谨跋。”密阳府，端宗二年（1454）本。

（2）《楚辞后语》1册（零本），木活字本（训炼都监字本），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5.1×16.5cm，有界，9行17字，注双行，内向三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宣祖——仁祖年间

①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154页。

② 金学主《朝鲜刊〈楚辞集注〉简说》，《东亚文化》第27辑（1989年）。

(1568—1649) 本。

(3) 《楚辞》1册, 训练都监字本, 四周双边, 半叶匡郭: 25.2×16.0cm, 9行17字, 注双行, 内向三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 光海郡年间(1609—1622) 本。

(4) 《楚辞后语》74张, 木板本, 四周单边, 半叶匡郭: 17.0×11.9cm, 无界, 9行18字, 注双行, 黑口, 内向二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 高丽末朝鲜王朝初期本。

(5) 《楚辞集注》1册, 木板本, 20张, 四周单边, 半叶匡郭: 19.3×12.0cm, 11行21字, 注双行, 内向黑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 朝鲜初期本。

(6) 《楚辞后语》卷1—6、《楚辞辩证》1册(卷下), 训练都监字本, 四周双边, 半叶匡郭: 24.7×15.7cm, 9行17字, 内向二叶花纹鱼尾。

以上仅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楚辞》的翻刻本就有十一种之多, 由此可以想见《楚辞》在韩国翻刻的次数和流通数量。令人遗憾的是, 楚辞学界至今未见介绍、揭示、研探这一传播盛况。

从我们收集到的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楚辞》翻刻本的版型来看, 主要有木板本和活字本两种, 活字本多为训练都监字、戊申字、甲寅字、丁酉字本。木板本则因刊刻时期不同而版型各有差异。木板本中除奎章阁所藏为三册外, 其他的主要为上、中、下三册或以元、亨、利、贞为顺序的四册本, 其以八卷本居多, 包括《后语》和《辩证》两部分。刊刻的时期大致是世宗朝到朝鲜王朝末期。此外, 多数图书馆中还藏有很多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刊写年未详的《楚辞》版本, 亦有待于考证。

最后, 韩国抄录本是现存于韩国的古代《楚辞》版本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献。目前, 我们已收集到分散在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抄本四十余种。其中, 较为典型的抄本有:

(1)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楚辞》1册, 安鼎福编。

(2) 韩国国学振兴院藏《楚辞集注》1册。

(3) 高丽大学图书馆藏《离骚经》1册, 无界, 10行字数不定, 无鱼尾, 朝鲜王朝高宗三十二年(1895) 本。里纸记: 岁在乙未三月, 自梧味洞……

(4) 韩国延世大学所藏《楚辞抄评》1册, 无界, 行字数不定, 无鱼尾。

(5) 东国大学与忠南大学所藏《楚辞抄》1册, 无界, 12行21字, 注双行, 半叶匡郭: 20.5×18.4cm。刊地未详、刊者未详, 朝鲜王朝后期笔写本。

(6) 忠南大学图书馆藏《楚辞灯》1册, 无界, 双行, 行字数不定, 半叶匡郭: 28.5×28.0cm。

韩国有关《楚辞》的选编本大部分是以抄录本形态存世, 有的选本亦夹注作者的评语。因而, 这种选本更能体现韩国文人对《楚辞》的批评价值。其中, 因各种抄录本选录楚辞作品的标准不同, 抄录的数量也有差异, 这种抄录可能是韩国文人在学习楚辞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般来说, 这些抄录本的数量远不及翻刻本, 故在当时传播范围相对有限。但是, 《楚辞》抄录本多有韩国文人的评注, 其注疏则是以异域者的眼光来观照楚辞文献。因此, 这种以抄录方式流传下来的《楚辞》抄本, 有着不可忽视的诠释、研究价值。例如, 安鼎福《楚辞》抄本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其编选的标准、评注内容等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如, 安鼎福《楚辞》抄本中保存了《思玄》的注疏内容。安氏注“仰先哲之玄训兮, 虽弥高其弗违”一句, 释云“言志求远交, 虽高不避也。”此等注疏在《思玄》中凡两百余则^①。经勘正, 此注释未见于《楚辞集注》的历代版本中, 亦未抄于《文选注》或其师李星湖之言说, 且朱在、朱鉴之跋文中未见朱熹有此笺注, 故我们推断此注盖为安鼎福所疏, 是其独有的治骚见解。此外, 安氏从朱熹所选五十二首拟骚诗中选定十七首进行抄录; 又, 安氏将俞安期《唐

^① 安鼎福《楚辞》,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第87—104页。

类函》与高棅《唐诗品汇》中唐代十一首拟骚诗歌抄录于《楚辞后语》之后，皆体现出安氏对唐代拟骚作品的赏爱与鉴别。

二 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情形

《楚辞》的传入，无论是其体式还是屈原的精神等，都对韩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表现为韩国文人对《楚辞》作品的大量阅读。

随着《楚辞》各种版本的流入以及韩国翻刻本的大量出现，《楚辞》成了韩国文人常见、常阅读的中国古代典籍，如宋相琦《南迁日录》载云“余自儿时，喜读《楚辞》诸篇，朝吟暮诵，至于《离骚经》，则读八百遍，盖欲以此为词赋应举计也。”^①南有容《观清寒子庙退述峰字》诗注有云：“先生喜读《离骚》，读已辄哭，哭已又歌。”^②《楚辞》，特别是《离骚》，至迟在朝鲜王朝著名文人金尚宪生活的时代，已经成为文坛尊崇的中国典籍，且已列入科举应试的重要内容。其在《松江原集跋》有云“《离骚》之文，后人哀其忠，愍其志，惜其才，传至今千百禩，为文苑之冠首……其文之必传后，爱惜如《离骚》者，无疑复，奚假于一二谈乎？”^③可见当时韩国文坛《楚辞》的流行。

现存的韩国文集中，有些文人直接用《读〈楚辞〉》、《读〈离骚〉》等为题咏怀抒发，如李穡《读〈骚〉自咏（二首）》、李詹《次张司成读〈离骚〉》、申光汉《书和〈离骚〉卷端》、闵齐仁《读〈离骚经〉》、宋奎濂《览宋玉〈九辩〉有感（乙卯）》、南有容《吊〈国殇〉》、李德懋《共茶溪散人李正夫（亨祥）读〈楚辞〉》等。一般来说，韩国文人往往是怀着崇敬屈原的心情来阅读《楚辞》的，如李荇《读〈离骚〉》有诗句云“早起有忙事，焚香读《楚辞》。”^④李紱《读〈楚辞〉》有云：“幽栢清晨读《楚辞》，《怀沙》孤愤想容仪。”^⑤带有虔诚、庄重之心。同时，一批韩国文人在了解屈原其人以及阅读屈原作品后，往往有感而发，创作了大量讴歌屈原的诗歌，如崔致远《荆南》、李齐贤《潇湘夜雨》、丁寿岗《吊屈原庙》、金安老《灵筠》、闵齐仁《汨罗怀古》、金麟厚《吊三间》、郑惟吉《屈沉汨罗》、宋时烈《次康节首尾吟韵（己未八月初九日）》第百十七首、宋奎濂《屈三间》等。

第二，《楚辞》在韩国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一批韩国文人的尊崇，并涌现出一批专门学习《楚辞》的典型文人，以至在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拟骚作品。

因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得到了一批古代韩国文人的认可，如郑弘溟《屈平词赋悬日月（课作）》有云“三闾才调能鸣世，千载词源正在斯。”^⑥李宜显在《陶谷杂著》中云“屈宋之词赋，盖自《三百篇》间巷歌谣而一变之为千古词家之祖。至其托寄寓兴之际，虽多荒怪不经之语，而忠愤慷慨，自可见性情之正。词句铿锵炜烨，又可为诗歌之冢嫡。”^⑦权珪夏《青泉先生续集序》有云“三代以降，左国之原于政理，楚骚之发于忠愤。皆为文章之宗。”^⑧有些韩国文人还将《楚辞》列入读书书目之中，如林象德在《小儿读书次第（乙未）》一文中强调文士入太学，“此后旁读韩文，选文精粹，古文真宝后集。兼诵杜七韩五长篇，《楚辞》、《九歌》、《九章》、

① 宋相琦《南迁日录》，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六卷，太学社1996年版，第51页。

② 南有容《雷渊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17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版，第63页。

③ 郑澈《松江集》，《韩国文集丛刊》第46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版，第166页。

④ 李荇《容斋先生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第435页。

⑤ 李紱《阴崖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1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第99页。

⑥ 郑弘溟《畸庵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87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版，第79页。

⑦ 李宜显《陶谷杂著》，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六卷，太学社1996年版，第239页。

⑧ 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版，第368页。

《九辩》、《离骚》及《选》赋”^①。安鼎福在《德谷书斋月朔讲会约·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中云：“《四书》本经既明之后，日看史，仍温前书。次读《通鉴》及参《纲目》。次读韩文，次读楚辞。”^②甚至当时在韩国儿童的画册中也有楚辞、屈原等题材，如郑宗鲁《立斋先生文集》卷六《题观儿小画帖》组诗之《屈原沉江》，则说明其时楚辞作品已经渗入到儿童普及读物的层面，亦可窥见《楚辞》在韩国盛行的范围。同时，朝鲜王朝中宗李恠亦提倡学习《楚辞》，如沈义《大观斋乱稿》卷之四《记梦》载云“朕闻诗有句法，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象物，叙事不病于声律，然后可与言诗。须以《三百篇》及《楚辞》为主，方见古人好处，自无浮靡气习。凡我臣僚，要体认得朕此意。”^③

因此，随着古代韩国文人对《楚辞》的尊崇及阅读《楚辞》的深入，文人创作中出现了很多拟骚之作，如徐居正《悲义冢辞》、洪裕孙《次贾谊吊屈原赋》、沈义《思美人辞（阅百济史，见义慈时事，不觉盈襟。因代忠臣兴首，摅愤以作）》、申光汉《和离骚经》、《拟招隐士（并序）》、郑弘溟《续招》、张维《续天问（并序）》、崔锡鼎《对续天问》、李玄锡《拟九辩》、申光洙《反招魂》、李种徽《续招隐》等。从以上仿作可以看出，东人拟骚作品主要集中在《离骚》、《天问》、《九歌》、《招魂》、《大招》、《九辩》等篇目，而这些作品也恰恰是中国文人认可度最高的楚辞作品，代表了楚辞体的高峰。由此亦可推知，相近的审美趣向，体现了共处汉文化圈背景下的中韩文人文学价值取向的契合。

同时，因拟骚创作在朝鲜王朝时代十分繁盛，且已进入对历代拟骚作品再研究、再创作的阶段，故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拟骚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按，崔锡鼎云“昔屈原作《天问》，以抒其忧悲瑰怪之辞。而柳子厚著说，以破其难，名曰《天对》。子厚于大道，未有所闻，宜其言之悖于经而流于淫也。近溪谷张子又演屈子之意，作《续天问》。凡造化幽明之故，物理人事之变，皆举以为问，而淫怪之说亡及焉。盖欲矫昔人之流遁而归之大中也。余尝读而美之，既而惜其有所难而无所取衷。妄为之论述，亦不敢辄以《天对》为目。就张子本题，并以对字，以病子厚援天以对之为谬且僭云。”^④可知崔锡鼎拟骚之作《对续天问》，是基于柳宗元《天对》、张维《续天问（并序）》的再创作，其目的在于发先人所未明，并纠正柳宗元《天对》的谬误。

第三，随着《楚辞》各种版本的传播，许多韩国文人不仅在诗文中论及屈原与《楚辞》，而且还用专文、诗话等形式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进行专门研究。

首先，综观韩国现存的各类文集及诗话，不难发现多数韩国文人皆论析屈原及《楚辞》。他们评述的内容涉及楚辞研究的诸多方面，如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第二十二之《屈原不宜死》、李荇《容斋先生集》卷五之《〈离骚〉后跋》、李敏求《东州先生文集》卷四之《屈原说》、吴光运《药山漫稿》卷一三之《史评》等，就屈原是否应以死明志、屈原是否赴水而死等展开论述。又如黄宗海《朽浅集》卷五之《四时墓祭》、李植《泽堂先生别集》卷一《答倭人问目》、朴世采《南溪先生朴文纯公文续集》卷一七之《答沈善长问》等就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节进行比较，其论皆认为，中国人于端午之日，纳饭于竹筒，投于江中以祭屈原之魂，多行礼于家庙，未见上冢，而韩国则例行墓祭。

另按，韩国许多文章涉及《楚辞》之词句辨正及作品解读等。如李德弘《艮斋先生续集》卷四《古文后集质疑》一文专门考证《离骚》中的字词；南有容《雷渊集》卷之一三《书沈存中笔谭后

① 林象德《老村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06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版，第89页。

② 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一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3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第64页。

③ 沈义《大观斋乱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第185页。

④ 崔锡鼎《明谷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版，第552页。

(取辨高唐赋一节)》辨正《高唐赋》之文意;而林泳《沧溪先生集》卷二四《读书札录》之《九歌解》、金昌翕《三渊集拾遗》卷二四《九歌解》等对《九歌》中的十一首诗歌做出解读;李晔光《芝峰类说》卷六《诸史》、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七之《檀弓》、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之《湘君、女嬃辩证说》等则对湘君、湘夫人、女嬃之身份进行辨析;李夏坤《头陀草》册九之《得康津书有感》、蔡之洪《凤岩集》卷一之《观物赋》、申景浚《旅庵遗稿》卷一〇之《淳园花卉杂说》等,就《楚辞》之香草及屈原虽言香草而未写梅花等问题进行考证;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八之《诗集传板本识误》、《研经斋全集续集》册一〇之《屈原》与《研经斋全集续集》册一四之《读楚辞集注》则论说《楚辞》版本、《大招》作者及《离骚》、《九章》之要旨。此外,现存的韩国诗话中,如李奎报《白云小说》、李齐贤《栢翁稗说》、车天辂《五山说林》、李晔光《芝峰类说》、南孝温《秋江冷话》、张维《溪谷漫笔》、宋相琦《南迁日记》、李宜显《陶谷杂著》、李瀾《星湖先生僊说》等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楚辞作品及其屈原等人的评论^①。以上韩国文人的论断中多数见解皆有理据,翔实可信。如,林泳《九歌解》认为自《东皇太一》至《山鬼》为《九歌》,而《国殇》、《礼魂》本不属于《九歌》,因《国殇》、《礼魂》两篇“辞义别而难晓者”,“则疑其以事神之词故类付焉”。此观点正与陆时雍、蒋驥、王闾运等认为《国殇》、《礼魂》为附加而应删除之“九篇说”异曲同工。同时,从李圭景引李陈玉《楚词笺注》所言“至于女嬃,李谦庵注,极为该博明晰,凿凿有据,可从者也……后之读《离骚》者参考,则可以辨释古今之疑矣!”^②我们亦可从中看出韩国文人在治骚时对中国治骚者的认同以及对楚辞学术史的深入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韩国文人在研读《楚辞》后,还写了大量的序、跋等,此序跋亦极有价值,我们可从序跋中清楚地了解韩国文人的治骚观念。如卢景任《注楚辞后识》阐释朱熹注《楚辞》之旨,李颐命《楚辞删跋》言其抄写《楚辞集注》时去取其篇目之意、李种徽《题〈楚词新集注〉后》则专论辞赋之托讽等。

其次,在《楚辞》流播韩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研究《楚辞》的韩国文人。其中,朝鲜王朝治骚文人的数量远超于其他时期,且以朝鲜王朝后期为盛,较为典型的文人有:

金时习,朝鲜王朝早期代表文人,是韩国文人中较早模拟屈赋写作并进行楚辞研究的文人。“动荡的时代、高洁的人格、忠贞的品格是金时习崇屈学骚的主要原因”^③。其《梅月堂文集》中模拟之作有《拟离骚》、《汨罗渊赋》、《拟吊湘累》、《拟天问》、《拟〈楚辞·九歌〉(四首)》等;其咏骚之作有《楚屈原赞》、《读〈楚辞〉》、《咏三谏臣》等。同时,《梅月堂》卷二三之《〈怀沙赋〉正义》则为《怀沙》释义,且十分重视版本的校勘。如其言“冤结一作郁结”、“本由一作本迪”、“职墨一作志墨”、“雉一作鹭”、“湑一作愍”、“拂一作蔽”、“人一作民。有命之有一作稟”以及“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其吾所臧”一句中“夫下有惟字”等,表明金氏治骚之谨严。此外,从此校勘语中,我们亦能推出金氏《〈怀沙赋〉正义》所抄之底本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张维,朝鲜王朝中期代表文人,是深入研究《楚辞》的韩国文人,主要表现为既有骚体的文学创作如《续天问(并序)》,其自言“尝妄自评鹭曰:词赋学骚选者六七篇,当与丽朝李文顺雁行。盖文顺笔力可畏,而典则或不足耳。”^④同时又有对《楚辞》作品的大量考索与品评,如《溪谷漫笔》中内容涉及《楚辞》字词训义、诗歌之旨、诗句用韵等方面。按,《溪谷漫笔》卷二考证《史记·屈原列传》“淖”字训义当为“洁清”之义,其谓“《史记·屈原传》曰‘濯淖污泥之中。’世人以淖

① 詹杭伦《韩国诗话论楚辞述评》,《中国楚辞学(第七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78页。

②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明文堂1982年版,第116页。

③ 吴绍钊《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第20卷第3期(2003年)。

④ 张维《溪谷漫笔》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第603页。

为泥淖之义，谓自濯于淖污泥之中。余尝疑古人造语，不应如是。而淖字训义，未能检出。偶看《淮南子·泰族训》曰“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于是乃知淖即洁清之义。所谓濯淖者洗濯而自令洁清也。又思之，古文以治污为污，治乱为乱。淖字或如是，盖治淖而使不淖之义也。”^①又按，《溪谷漫笔》卷一略论“句中再用韵，始于《离骚》、《卜居》曰：‘呢訾栗斯，喔咻儒儿，突梯滑稽，如脂如韦是也。汉魏以来谣语有类此者’”^②。

李瀛，是实学派代表人物，亦是朝鲜王朝后期深入研究《楚辞》、较多评价《楚辞》的著名文人，可谓槿域文人中的治骚名家。他对楚辞有着系统的研究，善于利用旁证和内证来解决楚辞作品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其对《楚辞》之考证，则专门写有《木兰宿莽》、《凿枘》、《屈原歌辞》、《倚伏》、《招隐士》、《启棘宾商》、《李白古风》、《别岁》、《登霞》、《光风》等篇。以上数篇，均出自李瀛《诗文门》，可以发现李氏的一系列创见。《木兰宿莽》点明屈原用对之精妙；《凿枘》则转化视角，用庄子哲思加以阐释；《屈原歌辞》将屈原、李白、杜甫的诗作进行比较，论李诗、杜诗之拟骚诗歌“终不若原之彻肝透膈，尽情而哀诉”；《李白古风》云屈原《离骚》为古风起兴见义之始；《登霞》、《光风》探《楚辞》“登霞”与“光风”之释义；《别岁》、《倚伏》论诗人用典；《招隐士》谓该篇是淮南小山为招淮南王刘安所作，并阐明自古通才讲正道与博取功名皆可两成。

不难发现，就朱熹学说，李瀛并非盲从，其曾言“圣贤遗书，终不可以悉晓，故朱子释亦或不免有未详难晓。”李瀛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看经岂不难乎？朱子以后，笺释之具备，莫如《庸》、《学》二书，其深义奥诀，置不论，《中庸》十九章注，宾弟子兄弟之子，此之字，即弟子之误。《大学》经一章注，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此止字，即至字之误。今古诸儒皆不能看得出也，但曰一字致疑则妄也。考校参互则罪也，朱子之文尚如此，况古经乎？东人之学，难免鲁莽矣。”^③故按以上《星湖先生僊说·启棘宾商》一则，知李氏在考论《楚辞》时亦不囿于朱熹之论说。按，《天问》“启棘宾商”，历来众说纷纭，聚讼未决。朱熹在《楚辞辩证》中否定王逸、洪兴祖等考证，以“启棘宾商”本是“启梦宾天”为解，“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如《列子》、《史记》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赵简子梦之帝所，而闻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之类耳”。李瀛因熟谙《朱子语类》，故在《星湖先生僊说》中转引《朱子语类》，其论及朱熹曾致信杨万里请教“启棘宾商”语义一事，后周益公呈以二说。但益公之说是否与朱熹今之论断相契合，已无从考知。于此，李氏并未赞同朱熹的释义，仅言朱熹求学于人，用功甚勤。相反，李瀛认为“棘，难也。宾商，犹言宾旅，谓艰难于宾旅商贾之间，卒践帝位也。”又，李氏言《九辩》与《九歌》皆启之乐章，后被屈原与宋玉仿效。以上列举李瀛之见地，言之成理，自成一说。

更为重要的是，李瀛之学术上承柳馨远，后发展为星湖学派。李瀛的治骚方法对其得意门生安鼎福有较大的影响。安鼎福推崇其师，其《楚辞》抄本中有五处称引李瀛学说，分别是《诗文门》之论《九歌》、《怀沙》、《三峰面》、《惜誓》、《招隐士》^④。按，安鼎福抄录《楚辞》以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其在抄录《楚辞辩证》中全部删去朱熹“启梦宾天”等言论，却在《楚辞辩证》中仅抄写其师言，“杨诚斋曰古帝王教子必置诸民间……”。可见，安鼎福不采朱熹之说而赞同其师。此外，安氏亦择取诸说，间疏其论骚观点，此在其抄录《天问》时尤为明显。就未能断定释义的语句，朱熹在《楚辞集注》中皆用“未详”写明。而安氏或因“未详”而不注，如《天问》“咸播秬黍，莆藿是营。

① 张维《溪谷漫笔》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第603页。

② 张维《溪谷漫笔》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第567页。

③ 参见白承锡《李瀛及其〈诗经疾书〉》，《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

④ 参见李瀛《星湖先生僊说（二十八——三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1760年；李瀛著、郑寅普校《星湖僊说》卷之一〇，文光书林1929年版。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朱熹注云“左氏云，‘萑苻之泽’是也，余未详。”^①而安氏未注；或抄其“未详”，如安氏注“石林，未详”，“靡蓐，未详何物”；抑或就朱熹未尽之处而注入己见，如朱熹注“康回凭怒，墜何故以东南倾”云“康回，共工名也，《列子》曰‘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此亦无稽之言，不答可也。”^②然安氏删去朱氏注“亦无稽之言，不答可也”，表明安氏认为《列子》所说并非无据。又，“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朱氏注“此章未详，诸说亦异”^③，然安氏则直接于此句下抄录洪兴祖所论，即“旧说启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反启伐之，故有扈遂为牧竖”。又按，《天问》“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朱熹注“隅，角也。”^④安鼎福未抄此解，转引《楚辞辩证》注云“《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无稽甚矣。”^⑤另，《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安氏亦转引《楚辞辩证》注云“淮南言，增城高万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又言，昆仑虚旁有四百四十门，而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安氏自注，“皆可笑矣”^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朝鲜王朝后期研骚的代表文人还有申维翰、黄景源、成海应等。按，李弥在申维翰墓志铭中称其“尤长于楚骚，诗句之入于娼优乐肆者多”^⑦。但目前我们尚未收集到申维翰论《楚辞》的观点，仅能从其文集《青泉集》卷六之《〈离骚经〉后叙》、《题〈楚词〉卷末》中略见一斑。其言：“五六岁时，从人受书，不喜读唐宋诗文，欲学《离骚经》……吾意三百篇诗人之旨，大抵实中有虚，如月在水，虚中有实，如镜照物。《庄子·逍遥游》、《秋水》诸篇，皆得此意，故文章最高。《离骚》一篇，即天地开辟以来，诗词创法之祖。观其声音情调，百节宛曲，无一字不出于爱君忧国，至诚惻怛，矢死靡他之意。”^⑧此论《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又言“余尝谓世之好《离骚》者，莫如我。解《离骚》者，莫如我。而文不得《离骚》者，亦莫如我。杨子所称颜渊苦孔之卓，余于《离骚》，能见其卓立者，亦幸矣。”^⑨此论其爱《离骚》，解《离骚》均超于前人。又如黄景源对《楚辞》亦有专门研究。其《江汉集》卷八之《考定〈离骚经〉序》言“校书郎王逸得向旧本而叙之。故《离骚经》十六卷，复行于世。然《离骚》有古六义。而《章句》无所发明，此逸之失也。太史公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盖《离骚》原于六义，而诸儒由汉以来，知《离骚》者诚寡矣。景源始考定章句，述其六义。而疑者皆阙之也。……《离骚》之有六义，与诗之有六义，未尝异也。景源既重其学术，而又惧后世之士，莫知《离骚》之有六义也，故为集诸家章句，而发挥焉。”^⑩此为黄氏自言其借考定诸家《离骚》注疏，以阐明《离骚》之六义。又，《江汉集》卷八之《〈楚辞补注〉序》则专文考证屈原之卒年，黄氏认为屈原死于楚怀王入秦不还，怀王既薨而屈原沉于汨罗之中，较楚辞学界如郭沫若言楚亡而自沉之说，似更切合屈原之为人。

第四，《楚辞》在韩国的流播，除了对韩国的汉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给韩国时调和歌辞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时调和歌辞是用韩文字创作出的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学体裁，一般是三句，主要用于抒情性的吟唱，一般在民间流传。随着屈原其人与《楚辞》作品在韩国的广泛流传，朝鲜文人在进行时调和歌辞的创

①②③④ 朱熹《楚辞集注》（第二册），聊城海源阁藏书，宋端平二年（1235）朱鉴刻本。

⑤ 安鼎福《楚辞》，第14页。

⑥ 安鼎福《楚辞》，第15页。

⑦ 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一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561页。

⑧ 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409页。

⑨ 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410页。

⑩ 黄景源《江汉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第160—161页。

作时，也自然地把有关屈原的传说和《楚辞》中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因而，以下分别阐述朴仁老时调与郑澈《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这两种国语诗歌所受《楚辞》影响的情况。

其一，时调因其篇幅短小，故只能引用屈原作品的语句和事例来作为作者抒情的一种手段，唱者或听者从时调中涉及楚辞的典故来引起共鸣，表达一种悲愤或哀伤的情感。如朝鲜王朝宣祖时期的朴仁老的时调：

汨罗내린물이 灵均의 怨泪로다. (汨罗之水是灵均的怨泪)

为国忠愤을 녀시라도 못내이지. (不能忘怀其为国的忠愤之心)

至今에 呜咽波声이 어제론듯 하얏나다. (其呜咽的声音如波涛般至今也声声在耳)

在这首时调的初、中、终三章中，作者利用“怨泪”、“忠愤”、“呜咽波声”来表达屈原的愤懑之情及屈原的高尚情结。此时调中作者通过引用屈原的典故，使歌者在歌唱的过程中来表达出一种悲伤愤慨的情怀，于屈原生平、悲愤情怀以及悠久遥远的影响，均惟妙惟肖，中肯得体，悲惋动人，堪为佳作。

其二，受《楚辞》影响的朝鲜歌辞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澈的《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金锡胄在《息庵先生遗稿》卷四中指出“松翁之《思美人》、《续美人》即歌曲之《九章》、《九辩》也，而俗妓之不解此已久。”^①又，金春泽《北轩集》言“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于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上，庶几近屈平之《离骚》。”^②此皆明确指出《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与《楚辞》的关系。对郑松江《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与屈原的《离骚》与《思美人》等的比较分析，一些韩国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如徐首生《松江的前后思美人曲研究》、李庆善《松江歌辞的比较文学试考》、金甲起《松江郑澈研究》、全兰英《屈赋与郑澈歌辞之比较研究》、李庆善《歌辞和辞赋的比较研究》、吴惠纯《松江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的要素》等，以上论文不仅论析了松江前后《思美人曲》的创作背景、内容，而且就其结构及音律数方面所受《离骚》及屈辞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然而，对韩国时调和歌辞所受《楚辞》影响的有关研究，现今还处于对个别作家作品比较分析的考察层面上。因此，对《楚辞》影响的这些时调和歌辞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文献整理和统计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展开。

综上所述，楚辞是中国诗歌的开山鼻祖之一，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东亚各地的传统文化发展起了莫大的影响。楚辞作品最早是在韩国的三国时期，约中国的隋唐之际，依托于《史记》、《汉书》、《文选》等文献传入韩国，逐渐为韩国古代文人所了解、喜爱。此后，随着古代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的加强、韩国古代翻刻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出现的楚辞中国刻本、日本刻本、韩国翻刻本与抄录本等，极大地促进了楚辞文学在韩国的流播。一批优秀的韩国文人不仅经常阅读楚辞、创作楚辞，而且系统地研究楚辞。他们对楚辞的学习、创作与研究，既给韩国的汉文学、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学典范，也为整个楚辞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 周建忠，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楚辞考论》等。

(责任编辑 孙少华)

① 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版，第172页。

② 金春泽《北轩居士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85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版，第108页。